



体育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作用

陶倩, 梁海飞

摘要: 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方法, 从民族精神的3层次探索体育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作用, 并审视和思考体育塑造民族精神的3个限度及其防范机制, 以此为基础促进民族凝聚、社会和谐。

关键词: 体育; 民族精神; 塑造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08)01-0052-07

Shaping Function of Sports on National Spirit

TAO Qian, LIANG Hai-fei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4, China)

Abstract: By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stud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haping function of sport on national spirit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national spirit and discusses the 3 limits for the sport shaping of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prevention mechanism so as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cohesion and the harmony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sport; national spirit; shaping

中西方学者对民族精神的研究主要从时间、空间、形态、性质等几个方面展开, 较少从民族精神的层次进行研究。研究民族精神的层次有助于对民族精神塑造的内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 从而为国家如何通过社会设置塑造民族精神提供路径选择。

民族精神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一般来说, 社会意识可以划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其中社会心理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 它通过直接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感情、情绪、风俗、习惯、自发的倾向和信念等表现出来。社会意识形式则是以相对稳定的形式存在, 是具有系统化、抽象化特征的社会意识, 是经过专门加工研究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包括政治和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哲学和科学等。从社会意识中的社会心理角度来看, 民族精神的初级层次应该包括以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情感以及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风俗、习惯等, 即社会风气; 由于一个社会中的道德、宗教、艺术哲学和科学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 而一个社会中的政治和法律思想则是人们对一个国家政治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思想和制度基础, 所以从社会意识中的社会意识形式角度来看, 民族精神的中级层次应该包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而其高级层次则是指政治归属。

通过对民族精神3个层次的分析, 人们可以运用诸如体育活动这样的社会设置使其民族情感得到激发, 从而增强自己的文化认同, 并进一步升华人们的政治归属。同时, 政治归属也反过来强化一个民族对其文化的认同, 并进而影响一个民族的社会心理层面的民族情感与社会风气。这3个层次的互动共同构成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事实。

1 体育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作用

1.1 激发民族情感

“情感一词被用来表示感觉与感情的一种简单联接, 在这个联接中, 感情过程支配着意识。”民族作为人类群体, 具有它群体的感情。例如, 对于本民族文化遗产的热爱与自豪, 对于本民族发展的自信。这种民族精神是属于情感范畴的东西, 民族情感其实是人们对民族性需要活动满足过程的体验。而体育作为群体性活动在激发民族情感方面有着与众不同的功用。借助体育的仪式性特征和象征意义, 人们的民族性需要在体育活动中得到满足, 其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则会得到激发和促进。

1.1.1 体育的仪式设置促进激发民族自豪感

英国人类学曼城学派代表人物维克多·特纳就是从仪式开始了他的人类学研究的。在特纳看来, 仪式就是一种调整手段。特纳把人类的社会关系分为两种状态: 一种是日常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社会关系保持着相对固定和稳定的结构模式, 特纳称之为“位置结构”。“位置”指的是包括法权地位、职业、职务、等级等社会常数, 个人为社会所承认的成熟状况以及人在特定时间内的生理、心理或感情状态; 另一种是不同于日常生活及社会关系的仪式状态, 仪式是一种处于稳定结构交界处的“反结构”现象, 仪式过程就是对仪式前和仪式后两个稳定状态的转换过程。特纳把仪式过程的这个阶段称作“阈限期”, 意指处于“反结构”状态的有限的时空阶段。特纳提出在过渡仪式中, 受礼者们领受了一种去异趋同的仪式, 他们以前的地位差别、性别差别、服装差别和角色差别统统都消失了, 这时人们体验到一种共同的感情, 这种共同的感情就是超越一切

收稿日期: 2007-10-26

第一作者简介: 陶倩, 女, 汉族,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社会科学。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社科学院, 上海 200444



正式的社会关系,使人们团结一致的人际情感。

根据特纳的理论,当人们身处激烈比赛的现场,在经历了惊险大逆转,或酣畅淋漓大获全胜之后,如60年代徐寅生12大板扣死日本选手星野以及2002年刘国正连破金泽洙7个赛点而取胜后升起五星红旗、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时,人们通过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情绪渲染,一种共同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油然而升。

1.1.2 体育的发展水平促进激发民族自信心

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同构性。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渐发展,用于体育事业的经费逐步加大,体育水平也不断得到提升,当在国际大赛上捷报频传时,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会得到极大提高,因为体育的成功反映了综合国力的提升,是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印证。

例如,1979年11月,我国在与国际体坛隔绝了20多年后,重新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为我国通过竞技体育向世界展示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了机会。从1984年我国体育代表团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我国体育代表团跃居金牌榜第二位,我国竞技体育年年都有进步,届届都有提高。每当举行像奥运会这样的大型比赛时,整个国家逐渐形成了人人关心奥运会的传统,而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体育健儿的优异成绩,又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了国人民族情感。

1.2 引导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指在某种社会心理的驱动下或某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表现出的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是群体性的、直接外化或体现社会意识的客观活动。体育作为当今社会主要的社会活动形式,由于其本身也具有群体参与的特征,人们在集体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定映射本民族精神的体育文化。因此,体育活动本身具有引领社会价值观的功能。同时,在传媒急速发展的今天,作为体育活动中个体的体育明星逐渐成为“社会价值、社会期待、社会风尚的载体”,他们的言行举止对追逐他们的体育爱好者的思想观念、价值观都有很深的影晌。

1.2.1 体育运动影响价值观

体育活动是现代人类生活中既涉及到物质生活又涉及到精神生活的一个特殊领域,它作为大众传媒对人们生活方式影响的一个载体,对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立竿见影的功用。从功能主义理论的视角来看,体育作为一种社会设置,是社会结构的一种基本单位,它促进了人们的共识和共同价值。体育活动中所蕴含的祖国至上、团结拼搏、敬业奉献、科学求实、艰苦奋斗、遵纪守法的体育精神也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体现,这些价值观在人们心目中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社会逐渐稳定的道德基础。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足球已经渗透到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足球在英国与其说是体育运动,不如说是一种体育文化。酒吧文化被视为英国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对英国男球迷来说,聚集在酒吧里边喝啤酒边看转播,同时大声喝彩会更加快乐。英国足球专栏作家大卫·考恩认为,足球赋予人们一种归属感和神秘的终极崇拜意识。大法官泰勒在英格兰足球历史上著名的“泰勒报告”

中称:足球已经渗透到英国人的骨髓之中,英国人血液里流淌的都是足球,无法遏止。

1.2.2 体育明星具有示范效应

体育明星发挥示范效应的机制包括两个过程:一是传播者的信息发布过程,表现为通过体育明星的自我包装以及与媒体的互动,充分展现体育明星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们身上体现的优秀的竞技精神,通过体育明星向社会传达积极健康的体育精神从而扩大体育明星社会影响力。传播学认为: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角度,不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总有自己的宗旨和宣传目的,也就是对某种传播效果的追求,期望能最大限度地影响受众的社会态度和思想观念。美国社会学家I·罗伯逊曾经这样描述大众传媒对人的影响:“从新闻、舆论到时髦风尚和时髦货,传播工具及时报道社会事件和社会变化。他们提供了人们可能绝对不能用别的方法看到的角色模式和生活方式掠影。”在职业体育中,优秀运动员是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灵魂。他们在吸引观众和球迷,提高和巩固俱乐部荣誉、提高票房价值和广告效应等方面所起的轰动效应,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比拟的。

二是受众的社会学习过程,具体包括班杜拉所说的模仿学习与强化替代两个阶段。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儿童的模仿可通过来自于榜样的未伴随奖励的环境或看到被示范的行为受到奖励而得到加强”。也就是说,儿童通过观察他们生活中重要人物的行为而学习社会行为,这些观察以心理表象或其他符号表征的形式存储在大脑中,来帮助他们模仿行为。体育明星虽然是社会活动中的个体,但是他们是社会价值、社会期待、社会风尚的载体,他们的一言一行极大地影响了周围的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

体育,借助媒体把运动员塑造成为英雄,来把特定情景中的互动,拓展到整个公共领域。体育倡导的一些价值,就在这种“仪式”中,通过体育明星的示范效应传递成了公共的价值特征并进而引导了社会风气。如在NBA联盟打球的姚明在2005年9月份参加“中华骨髓库校园爱心之旅”启动仪式,并现场抽取造血干细胞,呼吁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积极加入骨髓捐献志愿者的行列,救助白血病患者。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下,姚明的行为无疑给很多年轻人传递了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1.3 提高文化认同度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社会学家提到的文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他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从安东尼·吉登斯关于文化的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产生必须要经历成员共享、交流、合作,也就是说必须要经历一个群体行为的过程,是人类群体的共享成果。而体育的群体性特征决定了体育活动大多是多人参加,在活动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个参与者之间共享、合作和交流的群体行为的过程。同时,任何一种体育运动都会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日益形成一定的体育文化,作为这种文化的创造群体,体育活动中的各个成员彼此交流,共享文化成果,也必然认同这种体育所蕴涵的文化内涵。而几乎任何一种体育项目都有某个民族的烙印,因此,对某种体育文化的认同就是



对某个民族文化的认同。

1.3.1 体育活动的有效组织提高文化认同度

体育运动对文化认同的建构机制体现在以下3个过程：一是符号与意义的赋予过程；二是制度与行为的固化过程；三是精神与心灵的建构过程。

符号与意义的赋予过程。我国传统体育项目舞狮运动中的“狮子”在塑造民族精神中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狮子是中华民族力量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奋发开拓、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同时，狮子还承载了华夏儿女共同的精神寄托和信念追求：勇猛坚强、坚忍不拔、不畏艰险、锐意进取。这是兽中之王狮子的精神，更是深植于我们血液中的民族精神。舞狮运动中用“狮”这种动物所折射出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来熏陶教育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使其凝为一体。

制度与行为的固化过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通常在固定的时间与地点进行，使得大众易于接受和传播，最后形成一种民俗活动，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积淀。舞狮活动多以宗祠或朝社为单位组织舞狮团，称狮堂，如20世纪初至30年代，广西民间发起了“醒狮运动”，政府规定农村的每个村庄、城镇的街道以及军队的连队都要组织一个狮队，正月初一到十五为全省舞狮的日子。每当举办这些体育活动时，周围的人都参加，使人们不自觉地进入了这个民族群众成员的角色，从而增强了民族的文化认同。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龙舟竞渡作为人们在生活中逐步积累和建立起来的一种娱乐方式，是对族群共同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的认同。

精神与心灵的建构过程。海内外华人经常会在一些重要节日举行舞狮运动，狮子身上蕴含的象征意义一方面使炎黄子孙的认同感得以更好地实现，另一方面也使中华民族群体的内部凝聚力得到加强。同样，通过龙舟竞渡的参与，人们在凭吊屈原的同时也建构和强化了对屈原忧国忧民精神和龙舟象征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认同。

1.3.2 体育运动的发展进程提高文化认同度

体育运动的发展进程会模塑本民族的一代人，提高文化认同。以板球为例，板球运动很早就在英国盛行，并随着英国人开拓美洲大陆而传到美国东北部各地。但是，直到今天这项运动并没有真正融入美国人的生活却逐渐边缘化。与此同时，美国人却在板球的基础上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运动项目——棒球。

分析这两个运动的特点和发展进程，可以从3个方面解释这种现象。首先，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美国在早期急于要创立一种认同，一种美国客观发展和主观自我合法化的典型资产阶级性，而作为曾经是英国国球的板球运动在美国的边缘化则体现了作为“新世界”的美国对旧宗主国的蔑视，而美国国球棒球的建立则是美国重塑国家认同的表现，它的广泛传播则归功于它的“美国”身份；其次，美国社会学家将达尔文发现的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理论移植到社会中，认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也是美国实用主义国家哲学的基础。而作为贵族运动的板球运动，其体现出的彬彬有礼的传统英国绅士文化显然和崇尚竞争、胜利至上的美国文化格格不入，而棒球虽然激烈危险，但其中蕴涵的个人奋斗、敢于竞争、勇于创新的体育精神正是对美国文化精神的诠释；

最后，由于板球运动对运动员的装束和观众的行为举止有十分严格的限制，同时，早期的板球运动作为一项贵族运动几乎不允许社会中下层成员和女性参与其中，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板球在崇尚个性自由、民主、平等的美国被边缘化的命运。因此，可以说板球在美国的衰落是美国人对板球文化与自己民族文化冲突的深刻反思；而棒球在美国的兴起则是美国文化在体育运动中个性化的反映，也是美国人对以“独立、自由、平等、民主”为特征的美国精神的认同。

1.4 增强政治归属感

政治归属，这里指认同某个民族或国家。任何一个近代民族国家都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是境内居民的国家认同。如果说，民族国家制度是民族国家的“硬件”，那么国家认同就是“软件”。没有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民族主义只能表现为一种情感。没有国家认同感，已经建立的民族国家就没有稳固的心理基础。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和心理基础是相辅相成的。有学者认为，国家认同感是个人承认和接受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政治身份，并产生归属感。体育活动的群体性特征决定了体育活动有助于促进一个社会集体记忆的形成；随着体育对人们价值观、生活方式影响的日益深入，体育活动作为一个国家强化国家认同的工具性属性也凸现出来。

1.4.1 体育创造的集体记忆强化政治归属感

体育是一个合法的竞技场，长期以来，个人和集体（包括国家）就利用体育来表达它们的集体情感，形成集体记忆。体育竞技场塑造的集体记忆为政治归属感的再现与建构提供了强力资源。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立足比较史、历史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交叉视角，将民族想象共同体首次置于现代性的历史框架中，对于安德森而言，民族特性、民族特质以及民族主义，都是一种特殊文化的产物，而所有的“民族”都是被想象出来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通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体育活动讲求个人的积极参与和团队的协作配合，它营造了一个集体的氛围，使参与者在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前提下，借助集体的力量，获得更多的运动快感和创造出更好的成绩。同时，人与自然界的很多生物一样，需要“识性而同居”，这是生存的定理，一个人的力量是孤单的，一个人的生活是孤独的，快乐是别人创造的，也只有在群体中才能获得快乐，正是人的这种本性的需求和体育“群体性”特征的结合，使体育活动更容易创造能够建构政治认同感的集体记忆，这也使体育活动充满了魅力和凝聚力。

以足球为例，当一国足球队与另一国足球队的11名队员代表国家在足球场上拼杀的时候，很容易令人想象到我们是一个集体，无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有多么不同。巴西足球就是这样把全国人民汇到一起，给他们创造“相同的集体记忆”。在巴西人的记忆中，足球就是巴西，他们把对祖国的情感转化为对巴西足球队的热爱。特别是在世界杯期间，全国中小学放假，全民都把目光投向世界杯，足球比赛向巴西人表明，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完全不管种族、宗教、语言、教育、职业和收入的差异。黑人与白人在同一片蓝天下把足球播种得一片葱茏，一亿两千万巴西人的民



族自豪感齐聚于此。“足球兴邦”成为巴西男人信奉的政治。这种信念增强了他们对整个国家的归属感。

1.4.2 体育的国家工具属性增强政治归属感

体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当论及体育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关联时，政治是首要的因素。早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就普遍认识到了体育的国家工具性特征以及国际体育运动与政治的关系。通过体育运动展示国家的优越地位是大多数国家首要考虑的问题，被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政府看作是锻造“国家特征”的重要方面，体育也的确可以作为工具服务于具体的政治目的。在国家内部，体育经常被用来促进政治的社会化，以训练公民的社会政治观，支持国家政治系统的运作，维持国家政治生活，有助于保证国家政治的稳定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在国际关系中，体育则被用来建立国家声望和提升综合国力，以明确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确立在国际体系之内要追求的战略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外交政策，依靠自己的实力来维护本国的利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与文化计划办公室针对“公众认为怎样的民族成就是重要的”这个问题进行国际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体育在所有能引起对国家成就自豪感的指标中的比例位居第一。从这项调查结果我们不难看出，体育是公民对一国成就感到自豪的重要理由，体育成就是公民形成和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原因。当在体育比赛时两个人或者更多人自主地享有相同的符号、仪式、历史和话语等文化内容时，他们会认同属于同一个国家。韩国和朝鲜运动员先后四次在国际大型体育比赛中共同举旗联合入场，朝鲜南北双方又决定2008年将首次联合组队参加比赛，这对强化朝鲜半岛的民族认同，促进民族统一起到重要作用。

2 体育对民族精神的塑造限度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体育运动在激发民族情感、引导社会风气、提高文化认同度以及增强政治归属感4个方面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发生了积极影响。但是，由于从事体育运动的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攻击性，当在体育塑造民族精神的过程中这种攻击性过分显现时，无疑会对个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过分强调体育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功能则会滋生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理性民族主义，表现为民族气节、民族感情，能凝聚人心，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世界和睦相处。狭隘民族主义，表现为封闭意识或民族沙文主义，偏激的民族情绪、极端民族主义行为致使民族分裂、社会秩序混乱，破坏世界和谐。我们认为，在体育塑造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体育民族主义，本文把体育民族主义定义为狭隘民族主义在体育领域中的表现，它对体育参与者的身心发展、社会秩序稳定以及世界和谐发展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体育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当今世界体坛与政坛的同构性。各个国家日益重视体育在塑造民族精神方面的政治功能。但是将体育丰富多样的社会属性仅仅理解为政治属性，夸大体育的塑造民族精神方面的政治功能，必然会体育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便利；二是民族精神本身的“二重性”特征。强化体育对民族精神中的消极、落后因素不但不会促进社会稳定和

世界和谐，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我们既要认识到体育在塑造民族精神方面的积极作用，也不要夸大这种作用，时刻警惕体育民族主义的出现，充分认识到体育塑造民族精神的个体健康、社会稳定和世界和谐三个限度。

2.1 个体健康限度

2.1.1 体育促进个体健康的必要性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美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能力，而不仅仅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因此，我们认为，个体健康一般应该包括个体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而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是与它本身具有的健身功能分不开的。在体育塑造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体育必须发挥它使体育活动参与者体能增强、体格健美的功能。从社会历史进程来看，体育对于人类健康越来越重要，体育正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科学合理的运动是提高生活质量，保证健康生活方式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体育除了具有健身功能，还有“健心”功能。人们通过参与体育活动，也有利于增强个人对自身的感受，有利于加强人们的生活精力和活力，并能最大限度上促使人发挥生理、情绪和社会潜力。体育参与者能从身体活跃的过程和经历中获取力量，激发控制自身健康的信心，从而通过体育活动培养积极进取和个人效能的健康心理。

应该说，体育在发挥其民族精神塑造功能中必然会促进人体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而体育促进个体健康的最终目标正是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全面发展从不同角度做出了多种不同规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首先，人的生活的全面发展。体育确实具有这方面的功能，体育活动的多样性使人们有了多方面的，日益丰富多彩的生活。竞技性的体育活动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复于某一个技术动作的练习，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感受和体会对这一练习动作的理解和认识，对自己的行为主体价值进行不断地思索和体验，以达到自我价值实现和个体身心健康的目的。其次，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和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每个人都无可争辩地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在一切能力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最关注的还是个体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很显然，马克思所指的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正是体育促进个体身体和心理发展的价值所在。再次，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由于体育所具有的“群体性”和“连锁性”特征，所以体育便具有了使人社会化的功能，即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就是扩展人际关系的过程。最后，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集中体现，是个人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人的自主性、能动性、独特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展示。而体育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在体育活动中通过克服困难，发挥自我效能，逐步建立自信从而形成坚韧的体育品格。总之，体育本身有促进个体健康的功能，体育在塑造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不能为了塑造民族精神而背离体育的本质——个体健康。

2.1.2 体育塑造民族精神过度对个体健康的负面作用

尽管体育在传递其体育精神从而进一步塑造民族精神的过程中能够促进体育参与者的个体身心健康，但是当体育特



别是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过分开发了它在塑造民族精神方面的政治价值，夸大了金牌所代表的国家荣誉时，体育的功利性便无限膨胀，竞技已不再是体育，竞技已经成为人们谋取功利的手段，成为国家利益、民族“功利”的竞技场。同时，为了提高成绩，运动训练的科理性，使优秀运动员成为科技的“成果”，成为比赛“机器”，这对运动员的个体健康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资料显示，经常承受过度负荷的高水平竞技运动员经常会有大量的运动损伤，运动员的平局寿命低于正常人。而在学校体育中，体育教学同样在“生物体育观”指导下，强调学生的运动负荷，对体质强壮的科学性，使体育教育失去了对人的“终极关怀”。而那些通过训练也很难在竞争激烈的比赛中取得好名次的运动员在利益集团的驱使操纵下则会铤而走险，或虚报年龄，或服用兴奋剂。这样，技术异化形成“以物为本”的社会关系，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背离了竞技体育精神；技术异化使竞技运动轻精神，重物质，重竞技性，轻实用性，越来越不受公正比赛精神的束缚，沦落成低层次的娱乐消费，这些都背离了竞技体育的最初价值观；技术异化使人远离了劳动，精神压力剧增，同时药物的滥用造成对人体健康的伤害，摧毁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导致对人生命意义的缺失和漠视，引起人文精神的背离。《奥林匹克宪章》对奥林匹克主义作了如下的表述：“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它将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融为一体。奥林匹克主义所要建立的生活方式是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和一般伦理基本原则的推崇为基础的。”可见，过分强调体育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作用，必然会使体育的发展最终背离奥林匹克主义宣扬的对个体健康的关注，这样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体育很难在人的身心发展中体现对人身身心健康成长的关怀，也无法实现体育运动在促进人的全面的和谐发展方面的价值。

2.1.3 防范机制

通过以上两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体育虽然可以满足人们强身健体、发展心智的需要，在现实中体育确实培育了个体的身心健康，但是过分强调体育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功能，则会无形中对运动员施加更大的压力，甚至使运动员从体育运动的主体地位异化为塑造民族精神的工具，这也必然会使体育背离其运动精神，给个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在社会中建立损害个体健康的体育行为的防范机制尤为重要。要建立体育损害个体健康的防范机制最重要的是合理调整体育内部结构。体育结构决定体育功能，体育功能又制约着体育结构。所以，要在体育塑造民族精神中充分发挥体育对个体健康的培育功能，必须要调整体育的内部结构。合理整合体育内部结构，也就成了实现体育结构合理化、体育培育个体健康最佳化的首要途径。

合理调整体育的内部结构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确立和传播健康的社会体育思想、体育价值观念，使体育真正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价值，这是体育适度塑造民族精神的实践决策的深层依据。人们在体育活动中形成的体育思想和观念属于这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范畴，所以，在健康的体育思想、体育价值观念的指导下，体育才会适度地发挥它对个体健康的培育作用。其次，通过调整不同体育行为主体

的职责、权利和义务，来协调体育的个人体制、群体体制和全社会体制三者的互动关系，使之和谐有序地运行。“举国体制”和“锦标主义”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建国初期可以快速提升本国体育水平，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旧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体育的快速发展。个人在参与体育活动中会很自然地把自己融入到群体和社会中去，要协调个人与群体和社会的矛盾就必须在体制上明确三者各自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2.2 社会稳定限度

2.2.1 社会稳定的必要性

一个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社会的发展，而社会发展包括：环境、人口、居民生活、劳动、卫生保健、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体育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促进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这里要说的社会稳定是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前提，没有社会稳定，一切改革成果则会付诸东流。对于和谐社会这个概念，胡锦涛同志概括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我们可以初步地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应当是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和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应当是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服务网络不断健全的社会，应当是稳定有序、安定团结、各种矛盾得到妥善处理的社会。

体育运动是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塑造民族精神过程中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之一。体育运动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存在和再生，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平衡。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得到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明显改善，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一系列不和谐的社会问题，诸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犯罪等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等等。上述种种不协调、不和谐状况，不仅已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地快速的发展，而且也使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现实矛盾日益突出。根据功能主义理论，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通过人们之间共享价值、产生共识的过程，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整合在一起实现和谐发展。同时，一个社会要和谐稳定，这个社会系统要有保持自身平衡、从而持续有效地运作的倾向。由于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设置，它能够促进人们的共识与共同价值，而一个社会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取决于共识和共同价值。因此，体育运动行为和体育的组织形式通过促进这种平衡从而实现了体育对社会的整合功能并进一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2.2.2 体育塑造民族精神过度对社会稳定的负面作用

可以看出，功能主义理论关心的是体育运动如何满足社会系统的需要，如体育如何提供了种种以安全的方式释放紧张和挫折的环境，从而保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在体育塑造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体育确实是在向人们传递一些积极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从而增强了人们的共识和共同价值认同，但是，功能主义理论也常常夸大了体育运动的积极作用或者



对体育塑造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产生的危害社会稳定的现象视而不见。现代社会心理学有一种理论认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攻击性,与一切动物的攻击性一样,是一种保护自我存在的必要条件。而现实社会之所以时常出现不和谐现象,与人类的这种时时可能释放出来的天然的攻击性有关。体育的竞争是社会竞争的缩影,它的发展历史完整地保留、记录、展现着人类各个时期攻击性的表现。人们用体育运动来培养竞争意识,同时用体育运动来消释社会竞争中表现出来的攻击、侵略天性。

竞技体育具有强烈的情绪唤起功能,竞技体育具有宣泄功能。西格蒙·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认为,攻击类似饥饿和干渴,属于人本身的内在驱动力。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既然人的攻击行为与生俱来,因此它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与其他驱动力一样,攻击可以通过实现攻击或发泄攻击而得到控制。因为人类天性好斗,而这促进了体育运动和比赛,给社会提供了可以接受的宣泄好斗情绪的场所。本能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攻击使攻击驱动力得到发泄和宣泄。这种释放被禁锢的攻击性行为就是情感宣泄。然而,有些人认为体育运动和运动参与造成了挫折感,唤醒了运动员和观众的攻击性倾向,教会人们在生活中使用攻击性策略,并且支持某些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暴力文化。所以说在体育塑造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过高估计体育运动的社会整合功能。一旦过分强调体育在塑造民族精神中的政治属性,给运动员施加过大压力,这时候的运动员参与者处于激情状态。特别是处于消极激情状态的运动员反而最终会促进社会中的攻击性行为 and 暴力。攻击性就会在体育运动中得到狂热发展,甚至演变成球场暴力,引发球迷骚乱,泛滥危机社会和谐发展。

2.2.3 防范机制

既然我们体育塑造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把握不当就会适得其反引发社会的不稳定,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套社会安全阀机制,使体育活动成为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人类发泄攻击性的场所。正如社会生物学的创始人,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教授威尔逊所说:“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具有相同的攻击本能,这种内驱力必须通过竞争性体育运动或其他方式才能得到某种释放”。这种攻击本能释放的过程也是社会不安定因素消除的过程。科塞(1956)明确提出和阐述了社会安全阀概念。社会安全阀是社会冲突理论中用以表示社会冲突积极作用的概念,它是指各个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一类制度或习俗: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安全阀”一样的功能。它强调消除心理紧张在解决社会冲突、排除敌对和不满情绪中的作用。科塞认为敌对情绪的表达有3种方式:一是将敌对情绪发泄到该发泄的对象上,发泄到真正的对立面。二是替代,即把敌对行为指向替代目标。替代又可分为手段的替代与目标的替代。这里科塞提出了它的安全阀制度发挥作用的机制即“替罪羊机制”。三是没有对象的直接表现。例如酗酒、狂呼乱叫。科塞认为,敌对情绪的发泄具有安全阀的功能。安全阀是锅炉上的一个装置,它的作的蒸汽排泄出去,而不至于破坏整个装置。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也一样,

只不过它排泄出去的不是多余的蒸汽,而是猛烈的敌对情绪,因此有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

如果从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来理解,体育活动是名符其实的社会安全阀。在体育运动中人们有意识的、带责任感的、并在种种规范的控制下发泄自己的攻击性和侵略行为。体育运动的重大功能是代替那些最不可或缺、但又最危险的攻击行为,为人们的战斗狂热安上一个保险而又灵活的阀门。因此,在通过体育塑造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合理引导由体育的唤醒功能引起的民族主义情绪。首先要对把运动场进行监督管理,让它既成为一个发泄民族主义的场所,又对它进行适当的控制和引导,限制其政治化的程度(主要是剔除掉涉及最具体的政治议程和问题的东西,但可保留民族主义对抗情绪),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方向。

2.3 世界和谐限度

2.3.1 世界和谐的必要性

在塑造民族精神的体育活动特别是国际间的运动竞赛,不仅为种族和个体的战斗热情找到发泄的途径,而且还可以消除战争的危险性,从而促进世界和谐发展。体育在塑造民族精神的同时对世界和谐的贡献也可以从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对奥运会的理解得到体现。当他希望体育运动能够改善国家间的关系。1894年1月在他给各国国际体育组织的心中,表示希望在4年一度的奥运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通过和平的竞争促进国际监督团结。虽然奥运会中的仪式要求为胜利者奏国歌、升国旗,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并积极地塑造了民族精神。即使在政坛与体坛同构性的今天,奥运会都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体育运动就其性质而言,是非政治的。在像奥运会这样的大型体育盛会中强调的是各个民族之间的共同联系、共同利益、求同存异。所以,我们发现体育运动中蕴含的体育精神和价值取向应该说与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有共通之处。“和谐世界”的主张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体育仪式或是典礼,尤其是国家或国际体育,都给体育带来超出其作为有组织的竞技体育比赛的象征意义。正如《奥林匹克宪章》指出的,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竞争才有意义,各国运动员才能保持和加强团结、友谊的关系,奥林匹克运动才能实现它的神圣目标。

2.3.2 体育塑造民族精神过度对世界和谐的负面作用

在体育对人们生活方式影响力日益增大的今天,虽然体育的本质能够使得体育在塑造民族精神的时候促进世界和谐发展,但体坛与政坛的同构性也显现出来,运动被政府用来提高市民或者国民的认同感,强调与特定社会主导政治取向相一致的价值和取向。运动,尤其是世界级运动和精英竞技运动,在许多国家已被用来推崇与主导政治意识形态一致的价值及取向,结果看上去体坛越来越像政坛。各个国家逐渐认识到体育在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利用



体育来提高群体、社区或国家的声望以及增强群体或国家的认同感和团结感从而最终实现体育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功能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 过分强调体育的政治属性不但会抹杀体育的本质, 更会引起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 造成世界的不和谐。

政府利用运动过分宣扬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典型例子是1836年的纳粹德国。多数主办奥运会的国家利用这个机会展现国民及世界其他地方人民所喜欢的东西, 但是阿道夫·希特勒却通过二战前的柏林奥运会, 利用比赛大肆宣扬“日尔曼民族优越”的纳粹意识形态。纳粹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培训德国运动员, 这些运动员获得了89枚金牌: 比美国多23枚, 是柏林奥运会期间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4倍多。这就是杰西·欧文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的表现在那个历史时刻对那些不与德国结盟的国家如此重要的原因。欧文斯的4块金牌和世界纪录虽然没能阻止纳粹成为一个破坏性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 但却挑战了希特勒所宣扬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优越论。

当代社会体育和国家的发展也往往是同步的, 运动员和运动队如今甚至被作为保卫学校、城市和国家的象征性的勇士。一个国家在国际体育赛事中的失败会使该国在全球文化舞台上丧失声望。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当代世界, 体育甚至是战争的替代, 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是国家间体育成就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手段和工具。体育在国际关系中总是被作为各国政府可以利用的主要政治资源, 其他非政府组织也对其饶有兴趣。体育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 然而, 作为一种基于竞赛的文化形式, 体育是唯一对政治和意识形态操纵开放的文化形式。有时, 体育成为开展外交和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 成为众多越来越复杂的政治策略要素之一。大多国际大赛的参赛主体是民族国家, 因此演化成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 是一个不用枪炮的“战争”。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甚至因为足球比赛爆发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足球比赛火药味之浓, 在西方和东方, 恐怕是一样的, 最典型的案例便是英国。英国结有几大历史传统冤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 根源在两次战争; 其次是阿根廷, 根源在英阿战争; 再次是苏格兰; 还有就是法国, 英国一贯以来的传统竞争对手。其中, 以英德的矛盾最甚。每逢英德交战, 英国小报媒体就如临大敌, 大肆炒作, 对德国人及其球队竭尽讽刺和谩骂之势。此时身在英国, 可以感受到英国人对德国民族成见之深, 敌意之浓。可见, 在全球化背景下, 体育在塑造民族精神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的限度, 一方面体育有时维护了殖民统治和宣扬了民族沙文主义, 比如英联邦运动会就是英国殖民主义的遗迹和象征。另一方面, 在特殊历史条件下, 可能加剧民族分裂, 导致国家抗争。从这两方面可以看出, 体育对政治环境的消极作用会进一步恶化国家间关系, 对和谐世界的构建构成威胁。

2.3.3 防范机制

为了积极促进体育对和谐世界的正面影响, 就不得不面对体育在塑造民族精神过度时产生的危机世界和谐的问题, 建立一个防范机制才可以避免由于过度强化体育的民族精神塑造功能对和谐世界产生的不利影响。具体这个防范机制应该包括两部分: 一是正确区分体育在塑造民族精神时激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一些大型国际性运动会有意识

地采用一些突出国家外部标志的仪式, 这有助于增强以国家为单位的民族认同感, 引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意识, 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一旦过分强调体育的民族精神塑造功能, 便会给体育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提供滋生他们的土壤。但是体育引发的爱国主义情感并不会对世界的和平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为, 在闭幕式上, 所有运动员部分国家, 联袂携手而行, 又使人们感到世界是一个家庭。可以说, 在很多体育活动中只要能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便可以避免体育塑造民族精神时对和谐世界的不良影响。二是树立文明的包容观。这里的“包容观”主要体现在文明多样性具有合理性; 不同文明之间地位平等; 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和谐相处3个方面。体育塑造的民族精神也属于文化的一部分, 由于不同文化主体之间进行比赛必然会产生价值冲突, 但是当我们树立了文明的包容观, 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该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 更不应该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这种文化的冲突在体育比赛中却可以成为双方交流的理由, 并且这种文化的差异反而会促使双方借助体育活动相互借鉴、共同提高。

3 结语

体育对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 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都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陈至立在出席2007年全国体育总局局长会议时指出, 要充分发挥体育培养人们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塑造美好心灵、磨练坚强意志、弘扬社会正气、弘扬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的作用,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2008年奥运会即将来临, 北京奥运会是在我国举办的一项重大国际体育盛会,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胡锦涛2006年10月1日在北京市考察奥运会工程建设时指出, 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奥运会办好, 以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参考文献:

- [1] [美]J·P·查普林, T·S·克拉威克著, 林方译. 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120
- [2] 维克多·特纳著, 黄剑波等译.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94-97
- [3] 刘宏森, 陆小聪. 足球明星及其社会塑造——“体育和社会”对话之二[J]. 体育科研, 2005(3):11
- [4] [美]·罗伯逊著, 黄育馥译. 社会学(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161-162
- [5] A·班杜拉著, 林颖等译. 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上)[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91-93
- [6] 安东尼·吉登斯著, 赵旭东等译. 社会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29
- [7] 郑富兴, 高满怡.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认同感的培养[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5, (3):31-36
- [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 吴睿人译.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7

(责任编辑: 陈建萍)